

生命摆渡人,让爱一直延续

厦门器官捐献协调员林钦接受晨报记者专访,谈从业8年“冷”与“暖”



林钦。
记者 唐光峰 摄

晨报记者 张玲玲

利落的短发,阳光的外表,内心却是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柔。“80后”林钦是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器官捐献中心的一名医生,确切地说,她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,且全市只有她一人全职从事此项工作。

作为奔走在生死间的摆渡人,从业8年来,林钦感受过白眼、谩骂和推搡的“冷”,也触碰了很多令人感慨落泪的“暖”。她说,捐献者有着最纯洁的灵魂,能够化天各一方为血脉相连,突破生与死的藩篱,让爱延续。

近日,林钦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,讲述器官捐献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谈契机

器官供求悬殊,尽力搭建桥梁

记者: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项工作?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了这份特殊的工作?

林钦:我是从2015年8月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项工作的。

目前,公民脑死亡和心脏死亡供体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。但相对于欧美国家,中国器官捐献仍处于初级阶段,心、肝、肺、肾四大脏器需求大,供体有限,给临床移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

根据厦门市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,自2007年开展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,我市共有遗体登记2166例,器官(眼角膜)登记22325例(含国家器官捐献官网登记20088例),遗体捐献330例,眼角膜捐献314例,器官捐献137例(大器官425个),实际捐献507人,但需求缺口依然很大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尤为重要,可以说是生命延续的桥梁。我在协调员培训期间跟着老师学习相关知识,觉得这项工作很伟大,我想尽力去做推动这项事业进步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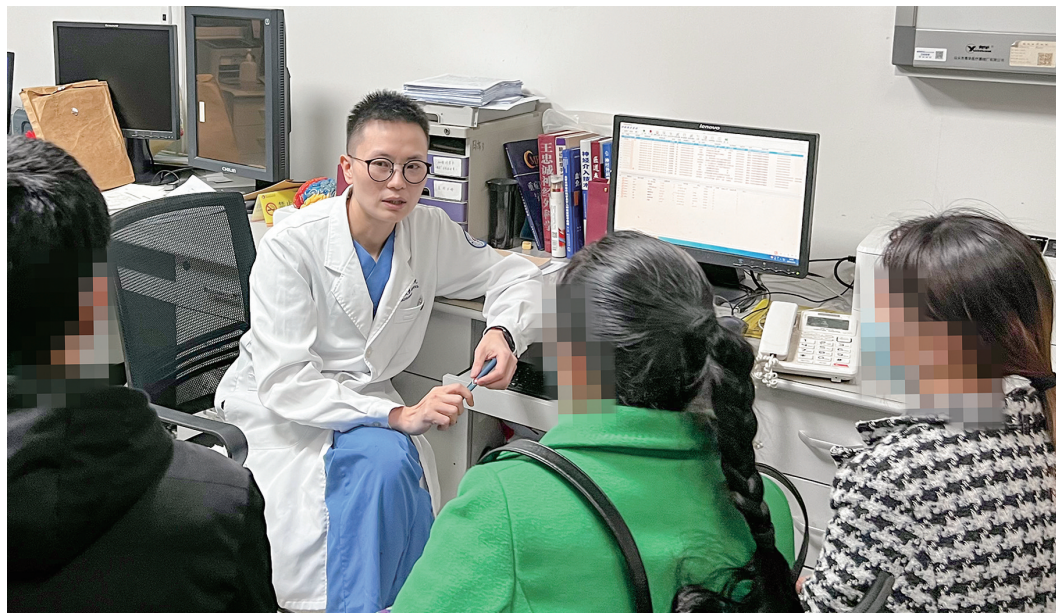
谈冷遇

曾被推搡辱骂,但理解越来越多

记者:这项工作很冷门,知者甚少,平时你是否经常遭遇不解和冷遇?

林钦:一开始我找家属谈的时候,不能穿白大褂,也不能表明身份,而是先以红十字会协调员的身份进行接触。从穿着到言语,都要非常小心,要照顾到家属的情绪。

我的老师曾经叮嘱我,和家属谈器官捐献的事情时,要选择靠近门口的地方,而且不要关门,一旦家属有抵触情绪,可以马上离开,



林钦与捐献者家属沟通。

避免自己受到伤害。

我刚开始不太理解,直到有一次,我打算找家属谈,还没开口说话,一名男家属突然站起来,用力把我推了几米远,并对我进行言语辱骂。原来,我在找同一病房的另一名家属谈的时候,他听到了谈话内容,也知道了我的身份,所以对我意见很大。

开展工作前,我需要先了解病人的情况,包括病情、家庭情况、信仰等,对于符合捐献条件的病人,给予家属选择的空间。当然,尊重他们的任何决定。

近几年,随着社会各界对器官捐献的持续关注,以及老百姓这方面意识的不断提高,我和同行的工作相对来说更好推进了。在2015年-2017年,谈10个能成1个,可以算是不错的成绩了。而如今,谈成功的概率达30%-40%,真的是质的飞跃。

谈工作

既是协调员,还是整理师

记者:你对接哪些医院呢?如何让医院和家属更容易接受和支持你的工作?

林钦:厦门市的所有医院都在我的工作范围内,所以我需要了解每家医院有捐献条件的病人的情况。

起初,为了得到医院和医生的支持和配合,我挨家跑,找院领导、找医生,像“推销员”一样大量发名片。同为志同道合的医生,都想要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,让生命得以延续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

做这项工作没有节假日、休息日,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。我和我的学生王宝宁两人轮流守着捐献者。去年12月,疫情影响下,王宝宁为了不拖累家人,在医院停车库的车里住了5天。

我还记得2021年春节,有一名捐献者的状态不太好,已经脑死亡,生命体征极为不稳。从腊月二十八开始,我和王宝宁就守在医院,除夕夜也是在医院度过的。因为捐献者的状态会变化很大,特别是最后的时刻,以秒计算。

家属同意后,捐献者的后续工作全部交给我处理。那时我不仅是器官捐献协调员,同时还是病人医生、家属心理医生、律师、朋友,也是捐献结束后的遗体整理师。我只有把每一步都做得格外仔细,才对得起家属对我的信任。

谈捐献

被每一位捐献者大爱所感染

记者:你说捐献者都有最纯洁的灵魂。做了8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,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?

林钦:曾经有一名40多岁的捐献者,他有严重的高血压。后来他脑干出血住院,病情发展只有两个结果,一个是植物人,一个是脑死亡。他清醒的时候明确表示,如果有一天他走了,有机会一定要捐

献器官。他的妻子通过医院找到我,想让她丈夫的生命能够得以延续。

我们在病床前守了7天,紧盯他的各种指标。其间,我帮助家属办理了各种手续。很不幸,他脑死亡,之后捐献了心、肝和肾脏。在我整理完遗体后,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突然跪下了,感谢我们,让他们的亲人能够继续“活”在世上,让他们有了寄托。那一刻,我也跟着掉下了眼泪。

还有一名40多岁的女性捐献者,来厦门出差时意外脑死亡。她和爱人非常恩爱,我亲眼所见,其爱人一夜白头。他们一家都是党员,主动提出要捐献器官。她的爱人跪在床边,边哭边说坚决不再婚,会把女儿养大。我也在一旁抹眼泪。

即使经历过很多生离死别的场景,我还是会被每一位捐献者的大爱所感染,暖到心里。

谈信任

聆听捐献者母亲倾诉思念

记者:捐献者的生命得到延续,家属肯定会万般思念。是否有家属向你打听移植者的情况?

林钦:我们的捐献采取“双盲”原则,双方家属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。

曾经有一名18岁的女孩捐献器官,她的妈妈经常问我“女儿”现在的情况,我都会陪这位母亲聊一会儿,听她倾诉对女儿的思念,然后告诉她,不打扰就是最好的惦念。

现在我的微信里有几千名好友,大多是捐献者、移植者家属。对每一条询问的信息,无论多晚,我都会尽量及时回。他们对我如此信任,我怎能辜负?



林钦在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看望患者。

记者 唐光峰 摄